

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

韩建华 李志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Abstract: Animal sacrifice make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archaeology, which reflects status and wealth of the tomb occupant. Due to the special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of pastoral life, animal offering and sacrifice in burial became an important custom,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cosmology and belief. The author, by analyzing the animal sacrifice phenomenon in the Xuewei burial No. 1 of the Reshui cemetery, concludes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nimal-sacrifice custom. By investigating the similar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reflected in the sacrificial animals in the Reshui cemeter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convergence of pastoral peoples out of interactions, while their mortuary custom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sacrificial animal category, inhumation method, sacrificial animal,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

摘要: 殉牲是考古学的重要现象和研究内容,是墓主人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游牧民族因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业形态,杀牲祭祀和墓葬殉牲是丧葬的重要习俗,也是某种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表现。本文对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现象进行梳理,从殉牲遗存的形式、殉牲的种类和埋葬方式等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归纳总结了殉牲习俗的一些特点和意义。最后通过殉牲现象对热水墓群殉牲的种类相同的原因以及表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解析,得出游牧民族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互动带来认同的趋同,但葬俗却固守着自身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 殉牲种类;埋葬方式;祭牲;多元特征

殉牲是指以各种动物遗存随葬的考古学现象,是墓主人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是族属、信仰的重要指征。殉牲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黄展岳曾讨论了殉牲,认为应该分为殉牲和祭牲两大类^[1],90年代霍巍在研究吐蕃时代墓葬时,称其为“动物殉祭”^[2]。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的殉牲现象曾引起很大的反响。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的考古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在都兰县热

水墓群发掘了著名的“血渭一号墓”,在墓葬封土、墓室和墓葬南侧均发现有殉牲遗存。

2018血渭一号墓是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近年来发掘的一座大型墓葬,由地上陵园和地下墓室组成,首次完整地呈现了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墓葬形制的典型代表。印章的出土及树木测年确定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王陵,为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证据。在2018血渭一号墓中、陵园内外、墓道、墓圻等发



图一 墓道殉马坑K3

现有各类殉牲遗迹，本文以考古学的视角，对各类殉牲遗迹从遗存形式、殉牲种类和埋藏形式及性质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对2018血渭一号墓及热水墓群的殉牲葬俗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 殉牲遗存的形式

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形式多样，除了三处殉牲坑外，还在祭祀建筑中发现有“烧饭祭”的动物骨骼、在封土和填土中埋入的动物骨骼、在南一侧室里完整的动物骨骼等。

(一) 殉牲坑

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坑共发现三处，在陵园外北部、墓道和墓圻内各有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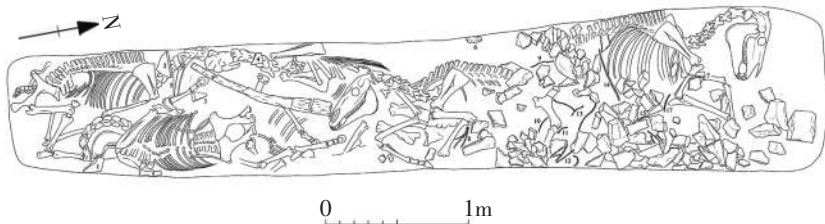
陵园外北部殉牲坑，编号K4，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米，南北宽1米，深1米。坑以生土为壁，未经处理。坑内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骨骼多为肢解后分层放入坑内。

墓道内殉牲坑，编号K3，位于墓道第九级台阶西，呈南北向，南北长6.6米，宽1~1.13米。坑壁修造规整，南坑壁上有一柱状凹槽，西壁外专门用草拌泥、石块垒砌加固。坑内北部堆有大量青石块和树枝，较为零乱，坑中还有一块长木板。马坑内殉有七具马骨架，马骨架的摆放很不规整，上下互相叠压，从南向北编1-7号。1号马骨架脖子旁有一块三角形红砂岩砖，马脖子上系有一颈带，丝织底衬，外镶银质牌

饰，牌上有蔓草纹。2号马骨架脖子弯曲变形；3号马骨架紧靠西壁，马头趺下，马头前有一块长木板，木板北端压着4号马头，5号马头朝北，保存相对完整。其东侧有大量碎石块和树枝。6号马骨架压在5号马骨架下面。7号马骨架位于最下边。这些马骨架经鉴定均为公马，年龄在4—6岁，个别有骑乘的经历。这些马骨架摆放没有规律，有些马骨的头弯曲变形厉害，推测是在现场处死后很快就埋入坑内。（图一，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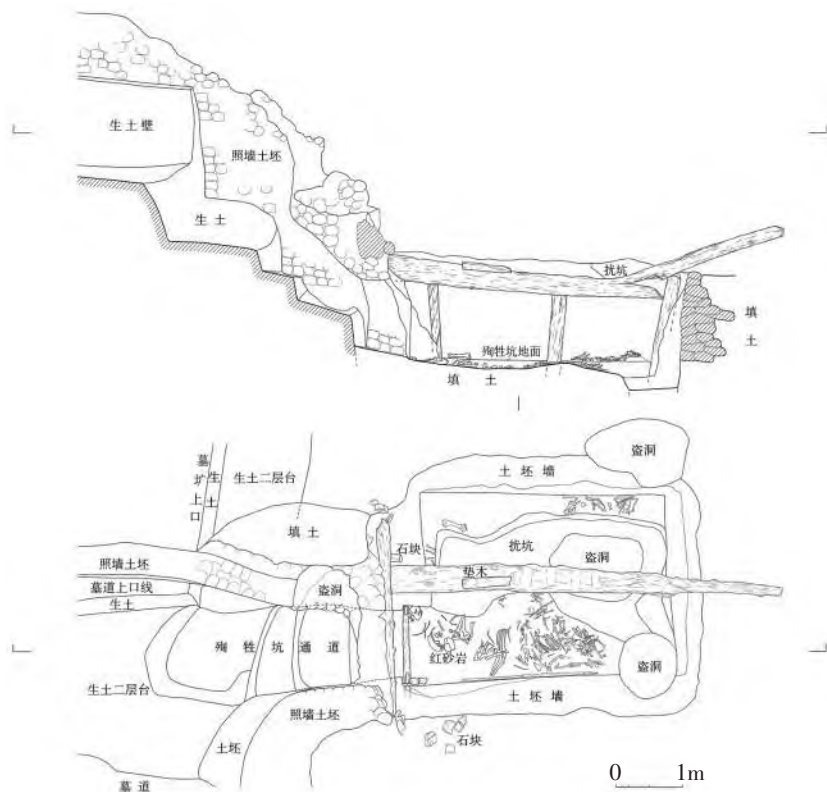
墓圻填土殉牲坑，编号K5，位于墓圻东南部填土内，有通道和墓道相通。通道东西向，开口在墓道南侧生土二层台上，向西穿照墙与殉牲坑相连。通道口近方形，东西1.29米，南北1.19米。通道设有三个不规则生土台阶，东西宽0.3~1.2米，南北长1.2~1.3米，高0.26~0.5米。自上而下第三级台阶底部与殉牲坑底部基本持平。在通道开口发现1块红砂砖块，在通道台阶底部发现3块红砂岩，推断红砂岩作为出入口或通道部位的标记之用。通道填土为灰褐色沙土，较疏松，第二级台阶有大量杂乱垒砌的大石块，推测起封门作用。（图三）

殉牲坑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3.5米，南北宽2.7米，深1.4米。坑壁用土坯块垒砌，土坯块内夹杂细木棍或芨芨草。坑壁平整，厚0.45~0.55米，高1.4米。坑底也是由土坯块砌筑，平整。殉牲坑东壁有门，门宽1.15米，高1.33米。门址保存有木质门构，有门砧、门槛和门楣。在门址附近发现2块红砂砖块。殉牲坑顶部平铺棚木，南北向并排，由于盗扰破坏，残存长短不一的10根棚木，推测原有14~15根。棚木下有一根横梁和三根立柱。横梁东西向，两端搭在东西两壁，



图二 墓道殉马坑K3平面图

1-4. 红砂岩 5. 胸攀 6. 铁器 7. 木钉 8-17. 红柳枝



图三 墓圪殉牲坑K5平面、剖视图

已折断，总长5.6米，直径0.18~0.31米。横梁下有三根立柱，东西两壁各一，中间一根，等距排列。立柱打破坑底，竖立在墓圪的碎石层上，仅西端柱子底部发现有础石。坑内出土大量动物骨骼，多为肢解后放入坑内，另外坑内还有铜片、铁块、珠饰、木簪等，坑底发现1件木鞘铁剑。

（二）祭祀建筑中的殉牲

2018血渭一号墓陵园东北隅发现祭祀建筑，由两座石砌房址组成。一号房址规模较大，边长11米左右，北向开门，门外有照壁。在该房址内发现与祭祀相关的遗存。其中在房内西北部发现一处动物骨骼，五块羊肩胛骨、一块肢骨放置在被火烧过的地面上，羊骨上放置一石块。另外此房址石墙里插有羊肩胛骨，目前在西墙、北墙内发现三处羊肩胛骨。（图四）

（三）封土、填土中的殉牲

2018血渭一号墓的封土中，不同部位、不同深度都有零星的动物骨骼发现，主要以羊角为主。填土中，在主墓室顶部的防盗碎石层，发现同一高度不同位置放置的卜骨，均是羊肩胛骨，

上有灼痕。（图五）

（四）墓室中的殉牲

2018血渭一号墓有五个墓室，一个主室和四个侧室。四个侧室在功能上有区别，其中可以明确南一侧室是庖厨，在该室内发现石磨盘、装粮食的陶罐、木案，还有漆盘、碗、杯等。在木案上有羊肋骨。

二 殉牲的种类与埋葬方式

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的埋葬方式复杂多样，有整具骨骼，也有头骨、蹄骨、肋骨、肢骨等。在殉牲坑内因埋藏空间有限，骨骼数量众多，分层叠压放置特征明显。

墓道殉马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典型特征。墓道殉牲，一般直接把牲畜放置在墓道，墓道承担了殉牲坑的功能。而2018血渭一号墓为埋葬殉马，在东向的墓道里专门挖出南北向长条状坑，整具马骨随意堆放，上下交错叠压，马骨变形严重。但马头的方向朝东，与墓道的方向比较一致，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被肢解的殉牲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主要埋葬方式。除墓道内殉牲坑外，在陵园外北部殉牲坑和墓圪填土的殉牲坑内，殉牲分层埋葬，随意放置，分布散乱。陵园外北部殉牲坑主要有骆驼、马、狗、山羊、鹿、鸟等，除狗骨基本完整外，其他以头骨为主。有些殉牲的头骨有特殊处理的痕迹。墓圪填土的殉牲坑的殉牲种类和部位有牦牛、黄牛、绵羊、山羊、马鹿的头骨和蹄骨等为主，其中绵羊头骨最多，还有大量肋骨，牦牛的腿骨。有些殉牲的头骨被故意损坏。殉牲中山羊、绵羊头向似乎不确定，有头东向，但也有其他方向。殉牲中出现牦牛，是经过剖尸肢解后入葬的，这可能与特殊的丧葬仪轨有关。

除殉牲坑以外，其他均以被肢解的羊骨为殉



图四 祭祀建筑的羊肩胛骨



图五 填土中的卜骨

牲。像陵园祭祀建筑的石墙中插的羊肩胛骨、祭祀所用的羊肩胛骨；还有墓圻防盗碎石层上的卜骨，也是羊肩胛骨；南一侧室木案上的羊肋骨等，表明羊在殉牲中表现出的绝对优势。其次是马、牛（包括黄牛和牦牛）、狗等，最少的是骆驼、黄羊、马鹿等。殉牲的数量基本能体现羊、马、牛在当时牲畜畜养中的结构比例，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同时野生动物黄羊、马鹿等也成为辅助性生活资源^[3]，狩猎成为游牧生活的重要生计手段。

三 殉牲习俗的分析

（一）殉牲还是祭牲

黄展岳最先提出“殉牲”和“祭牲”。所谓“殉牲”就是为死者在死后的阴间世界继续服务的殉葬动物，像驾车的马，供警卫的狗等。而“祭牲”就是作为墓葬祭祀而献祭的动物，以供祭祀用的祭品为特征^[4]。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来区分殉牲与祭牲，是相当困难的，故霍巍统称为“动物殉祭”，但对于区分明显的动物殉葬，还是明确了祭牲与殉牲的^[5]。2018血渭一号墓的随葬动物，无疑也存在殉牲和祭牲两种。

2018血渭一号墓的祭牲，主要是在地上陵园的祭祀建筑的动物骨骼，还有在封土和填土中零星出土的动物骨骼。

祭祀建筑一号房址的羊肩胛骨，放置在经过火烧过的地面，周边还发现有灰烬，这显然是生人供奉死者在阴间享受的“食物”痕迹，与北方游牧民

族祭祀有关。这种以祭祀亡者与鬼神为目的习俗称为“烧饭”，《续后汉书·北狄传》载：“杀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谓之‘烧饭’。”^[6]烧饭祭习俗并见于鲜卑和乌桓社会。《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引

王沈《魏书》称鲜卑“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史载乌丸（桓）“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7]。鲜卑还有绕墓而祭的风俗，这些被后世的北方游牧民族高车、突厥、契丹、蒙古等继承。《魏书·高车传》称“（高车人）多杀杂畜，烧骨以燎（祭），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8]。在2018血渭一号墓的陵园里就发现陵墙与封土间的回廊，以及陵墙的门址，这些都是祭祀时绕旋的通道。

另外在封土和填土中发现零星的动物骨骼，特别是在主墓室顶部的防盗碎石层中发现的三块卜骨，均为羊肩胛骨。这些卜骨上都有烧灼的痕迹，显然是与祭奠仪式相关，也暗示在墓室封顶之后，填上防盗层过程中，也伴随着祭奠、杀殉等仪式。

2018血渭一号墓的这些祭牲基本是以羊骨为主，共同特征是选取羊肩胛骨，据敦煌古藏文写本经卷记载，羊在当时的丧葬仪轨中主要是作为死者的替身，称为“遮庇羊”，具有招魂作用^[9]。当然羊骨的选择，可能与羊在当地的畜产构成中的地位和数量有关。王明珂以《后汉书》记录的汉军掳获北方游牧部族的牲畜时，对比了乌桓、鲜卑所在的辽西和西羌所在河湟谷地，前者有马牛而无羊，而后者几乎皆有羊^[10]。这个有趣的现象也说明羌人生活地区羊在畜产中的地位。

“殉马也是内亚游牧社会普遍的一种葬俗”^[11]，埋葬死者的过程中所杀的马，有可能是死者生前的坐骑，也可能是专门为殉葬挑选的马，这些马是殉牲，是要到阴间世界继续为死者服务的。关于埋葬死者生前所乘坐骑的用意，《三国志·魏

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王沈《魏书》,“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12]。2018血渭一号墓的长条沟状殉马坑,七匹曾有过骑乘经历的马被先行处死后放入坑内,虽因坑内空间狭小而扭曲变形严重,但骨骼完整,这些马有可能是专门挑选出来,年龄、性别都很统一。但是将殉马坑放在墓道内,显然不只是杀马以殉这么简单,某种程度上也有祭祀的意味。在敦煌的古藏文写本经卷中也有墓地祭祀的马匹明显有着职能上的区别,在葬仪队伍中,有飞跑马、宝马、香马、佩饰马等。甘肃武威天祝的慕容智墓的墓道内也殉有2匹整马^[13]。

陵园外的殉牲坑中殉葬的动物有骆驼、马、狗、山羊、鹿、鸟等,这个处在陵园外的坑,应该可能仿照苑囿,与“弋猎禽兽为事”的鲜卑生活习俗有关,马和狗是狩猎和畜牧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墓圻内的殉牲坑,严格来说相当于一个墓室,结构与墓室完全相同,有立柱、横梁和门道,从功能上来说是为墓主在另一世界储备的各类肉食,坑内还出土了铁剑。南一侧室从功能上来说,象征庖厨,放置在案板上的羊骨,是庖厨具象的展示,也是为死者在另一世界服务。这二者的殉牲特征明显。

(二) 殉牲与墓葬的方向

墓葬方向是墓主身份和族群的标识,更是文化认同和信仰的具象。北魏时代平城地区的墓向以西向和南向为主,早、晚阶段还有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而其背后映射的是拓跋鲜卑祭祀礼制的演变。平城墓向的变化反映了实际生活中民众对礼制的选择和趋向^[14]。

2018血渭一号墓为坐西朝东,墓道东向,这与游牧民族崇敬太阳、东向拜日的习俗有关。墓道殉马坑内的七匹马,无论身躯如何扭曲变形,马头都朝向东,这一现象与太阳崇拜有关。太阳崇拜是欧亚游牧民族中一个重要的习俗,在

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每日清晨驾驭由四匹快马曳引的太阳车,由东方出巡,傍晚落入西方的大洋里。太阳神的主要标志就是乘坐马车。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谈到中亚游牧的玛撒该塔伊人,“他们崇拜唯一的神就是太阳神,马是献给太阳的牺牲。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只有万物中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15]。在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曾出土过太阳神织锦^[16]。

游牧人群冬季牧场的选择,通常是在一个避风山谷的向阳坡上,尚东成为传统在文献里有相关记载。《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书》云:“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梁书·诸夷传》:“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户开。”《北史·突厥传》:“可汗恒于都金山处,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隋书·北狄列传》:“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游牧人群崇尚太阳,墓葬东向的传统与完善的殉牲模式相符相承。

(三) 殉牲种类

牲畜在游牧社会不仅是肉、奶等食物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他们的物质财富,殉牲种类和数量成为墓主人财富的直接标志。

墓葬殉牲动物的选择,一般都有着固定的结构,这与游牧人群的畜产结构及经济生态有密切关系。2018血渭一号墓中随葬的动物,驯养的畜畜有羊、马、牛、狗,奇畜有骆驼,另外还有鸟类,鸟骨的种属鉴定有一定的难度,暂归为禽类。殉牲不限于这些家畜,还包含野生动物黄羊、马鹿,显示出游牧、狩猎的多元生业模式。特别是牦牛、骆驼的出现,是热水墓群殉牲的新畜种。殉牲种类的选择与数量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关系,而与殉牲的目的有很大关系。如果把殉牲作为财富的象征,那么数量就是第一考虑因素;如果殉牲与宗教信仰有关时,那么种类可能就要特别考虑。2018血渭一号墓陵园外殉牲坑内唯一的一具骆驼头骨,上面有成排的红色三角形,这个可能是与某种信仰相关的殉牲,值得关注。

殉牲中以羊、马的数量为最多,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殉牲方式,殉羊多以头或肢骨象征整羊,

而马多以整具来殉葬。殉羊更多地表现为宗教含义。因为羊在羌人生活区域,除为重要的常畜品种外,它还具有招魂的特殊作用,所以殉羊在墓葬中更多地表现为祭牲,在祭祀建筑和墓葬填土中发现用羊肩胛骨来祭祀。殉马是贵族葬俗的重要内容,墓主的身份等级越高,殉葬的马匹数量就越多,《隋书》记载,“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17]。在热水墓群中,一般形制较大的墓葬,均有长条形殉马坑,同一殉坑内的殉马年龄、性别均有统一性。1982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的五个殉马坑,形制均长条形,东西向横列,按南北向依次排列,坑与坑之间相距约3米,殉马共87匹,一号坑殉马18匹,二号坑殉马17匹,三号坑殉马19匹^[18]。2014年发掘的哇沿水库的殉马坑K1是M7的殉牲坑,坑内5匹马均为13岁以上的雌性;殉马坑K2是M10的殉牲坑,坑内9匹马均为5岁以上的雄性^[19]。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马坑,坑内7匹马均为4~6岁的雄性。

肢解马鹿祭祀和以鹿血献祭,是苯教杀牲祭祀的重要内容,在2018血渭一号墓陵园外的殉牲坑内的马鹿骨骼,正是这种祭祀的孑遗,应该属于祭牲。

四 结语

都兰属于青藏高原东缘,该地是高山草原的地理环境,适宜牧业的发展,主要生业形态以游牧为主,草场高度在2700~3700米之间,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牦牛、马与犏牛。汉代以来,这片广阔地带主要是羌人的聚居地,《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下五谷,以产牧为业。”^[20]后来吐谷浑、吐蕃相继占领该区域,吐谷浑、吐蕃人,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民族交往、融合,生业形态的一致性,导致文化上的相似性,在葬俗方面都流行殉牲。

2018血渭一号墓是公元8世纪中期吐蕃时代的一座吐谷浑王陵,墓葬文化的多元性特征突出。殉牲方面,殉牲种类以羊、马、牛为主,考

古发现及文献记载表明,这是该区域活动的古代游牧民族共有的殉牲种类。墓道殉葬整马,这是保留了北方鲜卑族的殉牲习俗,牦牛、山羊、马鹿等献祭动物的种类和仪式,按照苯教的仪式举行葬礼,是吐蕃化的殉牲习俗。羊肩胛骨占卜、祭祀更多地是保留了羌人的殉牲传统。这一方面说明在民族融合地区,相似的生业形态导致殉牲种类的同一性,不同民族在葬俗方面会互相影响;但也可以反映出殉牲葬俗在保留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色方面的稳定性和顽固性。

吐蕃时期杀牲献祭之风的盛行,在此墓葬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墓圻填土中的殉牲坑,是墓葬封闭过程中仪式孑遗,专门以墓室的标准建造了殉牲坑,有棚木、立柱、横梁,还有门道、台阶与墓道相通。不仅动物种类多,而且数量惊人。大量的殉牲刺激着畜牧业的发展,文献记载为增加牲畜品种而有意识地驯养动物,据《贤者喜宴》载,朗日伦赞时“将公母野牦牛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鹿驯养成黄牛、将公母野驴驯化成马、将公母狼驯化成犬,将公母璋驯化成山羊,将公母山羊盐养成绵羊”^[21]。到赤松德赞时吐蕃社会的畜牧业发展到比较高的时期,据《贤者喜宴》载,“赤松德赞的大臣·聂达赞冬斯,首先规定每一民户必须饲养一匹马,一头犏牛,一头乳牛,一头黄牛,创夏季割青草,晒干备冬之先例”^[22]。

2018血渭一号墓所在的都兰地区,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中转站,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文化汇聚于此,互相接触、交流,经过不同政权下的多次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民族交融地区的墓葬,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具象表现。殉牲习俗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在固守自身特点的过程中,经过碰撞和交流,也在融合中发生着改变。

[1][4]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性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J].考古,1960(10).

[2][5][9] 霍巍.吐蕃时代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J].西藏研究,1994(4).

[3][10]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1、200.

- [6] 郝经撰. 续后汉书·北狄、匈奴传 [M]. (卷79上),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7]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833.
- [8] 魏收. 魏书 (卷130)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308.
- [11] 沈睿文. 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 [M] //北方民族考古 (第2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12] 魏收.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833.
-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甘肃西周时期吐谷浑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1 (2).
- [14] 倪润安. 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 [J]. 考古学报, 2014 (1).
- [15] 希罗多德著, 徐松岩译注. 历史 (卷1),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79-80.
- [16] 许新国.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 [J]. 中国藏学, 1997 (3).
- [17] 魏征. 隋书·附国 (卷83),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856.
- [18] 许新国. 吐蕃丧葬殉牲习俗研究 [J]. 青海文物, 1991 (6).
- [19]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青海都兰县哇沿水库古代墓葬2014年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8 (6).
- [20]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 (卷87),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869.
- [21] 孟作亭, 格桑塔杰. 西藏吐蕃时期畜牧业发展管窥 [J]. 西藏研究, 1989 (4).
- [22] 王尧, 陈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173.

(责任编辑: 黄林纳)

(上接第70页)

末, 东亚彩陶系统在此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西天山费尔干纳盆地楚斯特文化彩陶的一度复兴, 可以理解成天山彩陶在西天山地区的“回光返照”现象。彩陶文化在黄河中上游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地区的传播, 前后经历了数千年, 席卷了中国西北的大部区域, 构成了中国史前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 [1] 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考古文化, 有学者也称为天山北路文化, 或者称为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文化。因为天山北路在读音上容易与天山北麓混淆, 天山北路墓地最初发现的地点曾被称为林雅, 所以我们在相关论著中称其为林雅文化。
-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 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3); 陈戈. 略论焉不拉克文化 [J]. 西域研究, 1991 (1).
- [3] 林梅村.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J]. 西域研究, 2003 (3); 李水城. 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年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J]. 新疆文物, 1999 (1).
- [4] 刘学堂, 李文瑛.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C] //藏学研究 (第三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1-63.
- [5] 李水城. 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年东西文化的碰撞和

交流 [J]. 新疆文物, 1999 (1); 水涛. 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 [C] //国学研究 (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447-489.

-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呼图壁县石门子墓地考古发掘简报 [J]. 新疆文物, 2013 (2).
- [7] 李水城. 洋海墓地新见文物引出的问题 [J]. 吐鲁番学研究, 2009 (1); 又载李水城. 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229-231.
-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8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和硕县文化馆. 和硕县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 [J]. 新疆文物, 1986 (1).
- [9] 关于这一文化的命名, 不同的学者曾使用过“察吾呼沟文化”“察吾呼沟口文化”“察吾呼文化”等, 1999年出版的《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 1999年) 报告将其定名为“察吾呼文化”, 这一报告是目前最全面、最完整, 并对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关于这一文化的考古报告, 所以这里我们依《新疆察吾呼》将其称为察吾呼文化。
- [10] 卢立. A. 札德纳普罗伍斯基著, 刘文锁译. 费尔干纳的彩陶文化 [J]. 新疆文物, 1998 (1).

(责任编辑: 刘丁辉)